

### 《日据时期台湾人民抗日斗争史》:

# 一部致敬台湾人民抗日斗争的力作

2025年是台湾光复80周年,张海鹏先生主编的《日据时期台湾人民抗日斗争史》一书出版,以65万字的篇幅,向为抗日保台和台湾回归祖国而牺牲的先烈,向为祖国统一而奋斗的中国人深深致敬。全书通过文献梳理与史学分析,还原1895年至1945年间台湾人民持续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大量史实,鲜明驳斥“台独”分裂势力肆意歪曲、否认台湾光复历史的谬论。

1895年4月《马关条约》签订后,台湾及澎湖列岛被迫割让给日本,全体中国人民为之同悲。自从日军人侵开始,台湾人民就没有停止过抗争。当年,以丘逢甲为代表的台湾绅民与刘永福率领的“黑旗军”密切配合,开启了可歌可泣的抗日保台篇章。此后,台湾人民在日本殖民当局

严密的军政和警察制度统治下,接续发起了1907年北埔起义、1912年林圯埔起义、1913年苗栗事件、1914年六甲事件、1915年噍吧哖事件,以及1930年台湾少数民族莫那·鲁道领导的雾社起义等武装抗日斗争。据台湾革命同盟会不完全统计,共有65万台湾同胞在长期武装抗日斗争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,在中华民族抵抗外来侵略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。

噍吧哖事件后,台湾人民虽然改变了抗日手段,却始终没有改变誓不屈辱的态度。要求撤废“六三法”,台湾文化协会、台湾民众党的活动,台湾共产党与农工运动……非武装抗日斗争层出不穷,显示出台湾人民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的持久努力。连横、赖和、张我军、杨逵等台湾文化

战线上的抗日斗士,抱定以文保国、以史保种的决心,在日本帝国主义高压下,发愤作著书,向世人表明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,台湾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,台湾同胞是中国大家庭中的一分子。

1937年,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,殖民当局在台湾开展“皇民化”运动,妄图将台湾人民改造为“真正的日本人”。但即便在“皇民化”运动的顶峰,强烈的民族认同以及祖国观念,也使身处日本殖民统治之下的台湾同胞始终保有中国必胜、日本必败、台湾终将回归祖国的坚定信念。许多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台湾同胞,仍在坚持反抗日本侵略的正义斗争。日本政府机构保存的档案显示,台湾民众饱含家国情怀与民族大义的反抗事件



## 书评

### 带着“行囊”,寻回心灵的故乡

特约撰稿人 韩浩月 文/周

“行囊”一词,最早见于宋代洪迈《夷坚志补》,后被定义为“装钱与行李的袋子”。在钱有了专门的钱包之后,“行囊”就特指衣服与日常生活用品的包裹或箱子了。提到“行囊”,就会想到出门远行、风尘仆仆,想到旅途漫漫、四海为家。它不只是一个词语,更是一段悠久记忆的载体,一个旅行方式与文化概念的缩影。

苏虹的随笔集《逆风的行囊》,书名中出现了两个关键词。“行囊”作为其中之一,具有典型的标签作用,读者很容易判断出图书的内容构成,自动与“远方、童年、乡村、背井离乡、理想”等词建立关联。对于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来说,他们自然明白这个词的含义,但恐怕已难以唤起那么多丰富的联想,因为他们的“行囊”已经简化为一部智能手机,一机在手,就能展开他们的“特种兵旅行”。

另一个关键词“逆风”,最早出现于南朝宋刘义庆的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,意指反风向、迎风或顶风。“逆风”与“行囊”组合,由此便有了画面感:一名旅人背负行囊迎风行走的形象自然而然地诞生。对此画面,读者应不陌生,鲁迅从绍兴出发到南京、北平、上海等地,沈从文从湘西一路行至常德、北平,萧红与萧军从哈尔滨再到上海,均吻合“逆风的行囊”的描述,他们有一个共同点是,行囊中最不能少的书。

苏虹自己对于“逆风”的定义是,“既指向地理上从东方到西方的文化凝视,也隐喻对历史的回溯与对现实的反思”。苏虹对“逆风”的诠释,体现了一

名当代作家的视角。民国时期及更早现代作家的“逆风行走”,多蕴含一份挥之不去的凝重与忧虑,而当代作家的“逆风概念”,已经有了一份自信与淡定,因为他们已经有了更为稳固的精神根基,形成了稳定的核心能量场。《逆风的行囊》一书中,《魂梦故里》这一辑写到的童年生活与乡村记忆,为作者提供了一个永远可以回望与回归的故乡和精神原乡;《山河刻度》这一辑中刻画的山水与星空、花朵与瀑布等,让作者拥有了澎湃的胸怀;《欧洲掠影》这一辑描述的克莱蒙费朗的慢生活、厚重的阿维尼翁古城等,展现了作者开阔的外向观察视野;《砚边感怀》这一辑描摹的田园拾趣与市井烟火,兼顾了肉身与精神的双重需求,正是一代人向往的普通日子。

这种对“普通日子”价值的重新发现,在当下尤为珍贵,恰如刘震云所说,“最好的日子就是普通的日子”。但“普通的日子”并不能当成“简单的日子”来对待,如网友所形容的那样,“我的肉体,只需要很少的食物就能养活;而我的灵魂,需要山川、河流、自由,才能慰藉”。苏虹的《逆风的行囊》,十分妥帖地解释了这句话为什么会在网络上流行起来,这本书拥有许多能够慰藉心灵的元素,除了山川、河流、自由之外,还有小路、喜鹊、鸽哨、钟声、白玉兰、古琴等等貌似渺小、实则宏大的事物。能把普通的日子过好,其实容易,也不容易。容易的原因是,一个人有了境界与格局,日子便会服帖、温顺起来;不容易的缘由是,错将“普通”等同于俗气与庸常,从而丧失了发现和安享“普通日子”内在光芒的能力。

《逆风的行囊》是一次暗藏光环的写作。它借行走来审视停顿,通过出发来实现到达;它以轻盈来诠释重量,以缓慢来抵抗迅速;它在给予中收获,在接纳中馈赠……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的那样,“人生最远的旅行,并非抵达某个地理的终点,而是历经跋涉之后,最终走向自己内心深处的那段归途”。这样的观点,曾被以及正在被无数人实践着,《逆风的行囊》提供了一幅实践的路线图,循此路径,或可助读者更易叩问内心,寻回心灵的故乡。



### 《青白石阶》:

## 在轮椅上,走向文学的最深处

如果生来即双腿不能走路,意味着无法正常上学、工作、交朋友……这正是笔名“柳客行”的马骏的真实处境。因为身体残疾,他深陷孤独之中。如果孤独是困境,要如何解困?散文集《青白石阶》给予读者最深刻的启发,莫过于在讲述自我处境的同时,提供了一条突围之道。

马骏是个残疾人。对他来讲,因身体残疾带来的最大“残疾”,莫过于人在人群之外。那么,这个残疾人如何在身体残疾的情况下,让自己内心不“残疾”呢?

他从书籍、从文学中获取斗志。在《价值》中,他写道:“幸运的是,我读了点书,虽然考上大学,但腿脚没有力气,站也站不起来,生活无法自理的我也就设法去远方读大学,但毕竟是读过几天书的,也有幸接触了文学。这条小径上认识的第一个人便是史铁生,初读史铁生先生的《我与地坛》,史铁生先生在地坛的生活模样让我很向往,向往那份勇敢。”人与书籍、作家的相遇是缘分,是注定。这是马骏无与伦比的幸运,若没有遇见史铁生,他的生活定然是另一种情

形。读余秋雨《文化苦旅》,让他意识到:“活着并且思考就是价值。”既然双脚不能行走,就让思想翱翔于黄土高原上,穿梭于人类文明史的古与今。

他从日常生活所见、所闻、所感中汲取力量。即将被拆掉的房子楼顶的绿树,对马骏来讲意味着什么?他说:“我此刻只是想多看它几眼,记住它的模样,记住它纯天然的绿,记住它油亮油亮的绿皮,记住它迎风而动的姿态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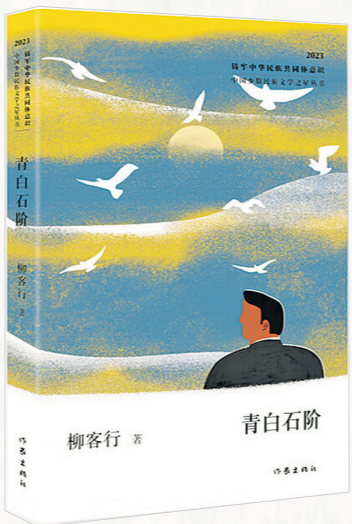
无处不在的阳光对很多人来讲,是不以为珍贵的。对马骏来讲,则不是这样。“阳光布满大地那一刻,我便时刻清楚自己的模样,既然外表已经无法挽救,但心灵的寄托不一定要用外表来承托。我该怎么做,我该做什么,光总会穿过躯体直射内心告诉我答案,这也是我期盼光芒的一个理由吧。在光亮下我写该写的,想该想的,说该说的。”渴望阳光,是马骏内心世界的显著特征。对他来讲,阳光不仅是现实的,更是精神层面的召唤,它让他坚信,不管现实多么凄凉,光与热从未完全消失。

散文集《青白石阶》展示的正是马骏的“逆袭”之路与成长之径。此二者没有哪一个更重要的说法,也无须区分到来的先后,日常所见与阅读所得,或各行其道或互相交叉,为马骏内心提供必要的营养。

这个考上大学却无法读大学的“九五”后,是身体上的弱者,却是精神上的强者。如果说身体的折磨是马骏早已习惯了的。那么内心的折磨与煎熬,才是最痛苦的,也是马骏在这部散文中着墨最多的。这样的文字,注定走向倾诉,写作如同对好友的倾诉,毫无保留、无需掩盖。笔下所写即心中所想。这是马骏对读者的赤诚,也是他对文学的赤诚。

这是困境之书,也是反抗之书。对马骏来讲,荣誉“骏马奖”这样的国家级文学大奖固然也是对他意志力的极大褒奖,可是,只需往前追溯,在马骏提笔写作的最初时刻,反抗的姿态已然形成。

在《坦然》中,他写道:“我笑世俗是枷锁,却无法困束我的心;我笑目光似尖刀,却无法刺穿我的脾脏;我笑批判如恶魔,却难抓住我的魂。”这是他的宣言,不为说给别人听,只为说给自己听。



却难抓住我的魂。”这是他的宣言,不为说给别人听,只为说给自己听。

品读此书,视角的选择比收获的启悟重要得多。视角决定立场,不是站在能够行走之人的高度俯视他,而是要怀抱一份肃然起敬之心,审视马骏在生活中的挣扎与抗争,敬畏苦难与无常,敬畏人性原生的能量。坐在轮椅上,不沉沦于自暴自弃、怨天尤人,且能提起笔来书写内心的焦虑、暴躁、不甘,并最终收获感恩、快乐、幸福,这是多数人做不到的。

张家鸿

### 《地球友好,你在奔跑》:

## 聚焦环保事业中那些普通人

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设立的“地球卫士奖”,旨在表彰那些在环境保护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。2018年起,浙江先后有3个案例获得此奖项。作家王国平对这3个案例进行了调研和采访,便有了这本《地球友好,你在奔跑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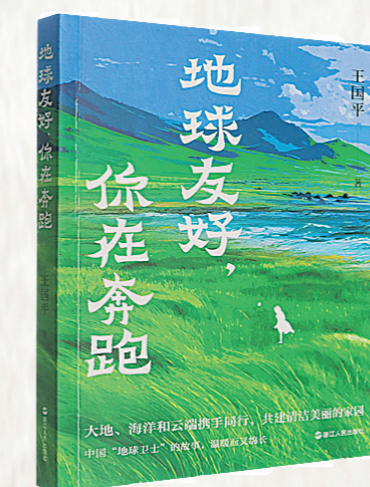
作品以生动的文字讲述了2018年获奖的“千村示范、万村整治”工程,2019年获奖的“蚂蚁森林”项目和2023年获奖的“蓝色循环”海洋塑料废弃物治理模式背后的故事。在获奖案例取得的辉煌成绩之外,王国平还捕捉到了它们之所以获得广泛的社会反响,是因为有众多热心生态保护的普通人参与其中这一奥秘。

王国平让普通人成为书的主角,揭示了这些环保案例是如何依靠广大群众获得成功的。比如旨在改变农村人生活环境的“千万工程”,要让它真正落实,关键在于得到村民发自内心的认同与主动参与。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千江镇上头村党支部原书记黄松主要修路,遭到一些村民反对。他明白“地上的路要畅通,心间的路也要畅通”,于是他一家一户耐心做工作,修路时守在现场,一有矛盾出现,第一时间出来“解扣”。村民的心解开了,通往村里的水泥路也修通了。又如海洋塑料废弃物

治理,关键是要让渔民改变传统的行为习惯。因此“蓝色循环”项目的参与者郭文标被选定为一个“小蓝之家”的当家人后,就发动村里的阿公阿婆,邀请他们成为“小蓝之家”的成员,在实践中提升环保意识。像郭文标和阿公阿婆这样的环保志愿者,已经累计收集海洋垃圾约9万吨,这些垃圾都是这些普通人一点一点捡拾出来的。“蚂蚁森林”项目展现出数字时代群众参与环保的新形态。王国平从中选取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,如参与许明娟为了在云端种一棵胡杨树坚持每天步行。年轻人将环保变成一种可以“打卡”“比拼”“分享”的社交行为。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将年轻人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情趣融为一体,让保护地球成为举手之劳。

王国平不仅从这些环保案例中看到普通人发挥的作用,还看到普通人的不普通,即他们的言行里有着鲜明的生态意识。作者不仅记录了“千万工程”,还特别强调生态意识是如何在工程实施中逐渐深入人心的。比如当村民意识到人居环境改善的必要性,意识到“要想富,美要足”“要想美,治垃圾”后,随之而来的“厕所革命”“污水革命”也紧跟而上。若要问他们保持“美丽”的方式,回答则是“低碳,循环,绿色,智能”。王国平既写出这些环保项目广泛的群众基础,也写出了其中坚实的思想基础。

《地球友好,你在奔跑》告诉读者,那些在田间劳作、在海上奔波、在工作岗位上耕耘的普通人,一旦与一个明确的生态目标联系起来,就可能成为真正的“地球卫士”。王国平在采访中一定是被这些充满热情与活力的“地球卫士”所感染,因此他的书名同样充满活力——“你在奔跑”,仿佛与我们一个个的“你”在打招呼。那就让我们一起去参与作者的热情招呼,那就让我们一起参与到这场生态环保的奔跑中吧!



贺绍俊

### 《吾家蜀江上:苏轼在眉山》:

## 回望一代文豪文化生命的起点

四川省眉山市政协所著《吾家蜀江上:苏轼在眉山》(下文简称《吾家蜀江上》),是一部旨在厘清苏轼文化生命起点的作品。它聚焦于苏轼生命中长达33年、却被学界相对忽视的眉山时期,系统地还原了这位文化巨擘得以孕育、生长的最初土壤。全书以严谨的史学考据为基石,探查苏轼家族脉络,清晰地勾勒出苏轼受深厚家学家风熏陶的经历。该书将苏轼的个体成长,置于北宋眉山这一特定的宏大时空中,详尽考察了促成眉山在两宋时期涌现“八百进士”文化奇观的地域基因,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对苏轼前半生生平经历的研究,完成了一次对苏轼文化基因的测序,让我们了解到苏轼取得的成就并非无源之水,起点正始于“吾家蜀江上”。

历史书写面临的一个巨大难题是,如何在冰冷的史料与鲜活的生命之间找到平衡点。《吾家蜀江上》给出了独具匠心的回答。著者通过虚构与非虚构的有机融合,让历史人物从故纸堆中走出,重新获得血肉与温度。

该书在坚实的历史骨架上,恰到好处地添加了文学的血肉。书中对蜀江风物的描绘,对苏轼少年生活的想象,对苏家日常场景的再现,无不鲜活饱满。这些内容的填充不是无根的虚构,而是基于对历史情境的深刻理解,对人物性格的精准把握。这部作品最打动人之处,或许不在于它告诉我们多少未知的史实,而在于它如何以诗意的语言和文学性的表达,将史实转化为生动的历史叙事。透过文字即可看见那个站在蜀江畔的青年苏轼,感受他对故乡山水的深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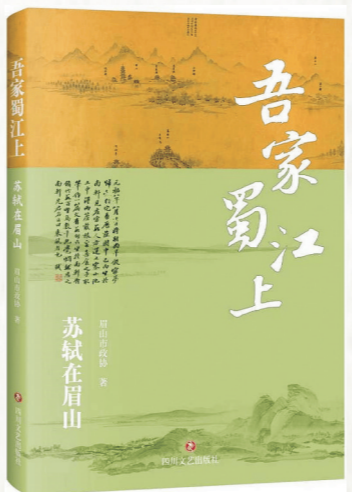
值得注意的是,该书由多位作者合作完成,但读来却“斧凿无痕,浑然一体”。这种统一性不仅来自共同的地域文化背景,更来自共享的文学审美与诗性追求。各位作者在保持个人风格的同时,共同营造了一种深情而不滥情、典雅而不晦涩的语言氛围。无论是描述苏轼家族的迁徙历史,还是再现眉山的市井生活,文字始终保持着文学的品质与诗性的光泽。

苏轼从眉山汲取了最初的文

化养分,而他的不朽成就又反过来定义了眉山的文化品格,使“东坡故里”从地理坐标升华为文化符号。这种双向塑造关系,让眉山在千年后依然能与这位文化巨子展开跨越时空的对话,让地方文化资源转化为持续的文化创造力。《吾家蜀江上》本身也是当代眉山文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,是眉山对自身文化资源的重新发掘与激活,是“东坡故里”这一文化IP的构建与深化。

在全球化对地方文化冲击日益明显的今天,如何保持文化的多样性与地方特色成为重要课题。《吾家蜀江上》尝试了一条可能路径,即通过深入挖掘地方文化资源,将其转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符号。这种将学术研究、文学创作与地方文化建设相结合,体现出人文研究的现实意义与社会价值。

《吾家蜀江上》通过虚构与非虚构的融合、诗性叙事的彰显以及地方路径的探索,对历史书写作出了有益尝试。在这种尝试中,历史不再是冰冷的过去,而是可以与当下对话的活的传



统;文化巨子不再是遥远的符号,而是有根有底、可亲可感的生命个体;地方不再是边缘的存在,而是文化创造的源源泉。真正的历史研究不仅回顾过去,更面向未来。《吾家蜀江上》为我们展示了历史书写新的可能性。

苏轼有金句:“此心安处是吾乡。”读罢全书我们更加理解,苏轼的“心安”能力,正是源于他在眉山蜀江畔打下的深厚文化根基以及获得的精神内蕴。而这本书本身,也成为连接历史与当代、故乡与世界的一座桥梁,让苏轼的文化精神得以在今天产生经久的回响。

刘小波